

第十二章 重访处于转换期的台湾

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台湾

1986年3月初，我回到东京，担任中国·亚洲地区的编委。那时，开始考虑得较多的是台湾内部的动向，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将怎样发展下去的问题。

时代的变迁，环境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本土的“国共内战”中被打败，于1949年把其本部移到了台湾。国民党自那以后也一直主张自己作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是代表中国的。在台湾地区还发布了戒严令（49年5月19日发布，翌日20日起执行），把台湾作为“光复大陆”的基地，实行一党独裁的军事管制，一直与中国本土中国共产党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峙和抗争。

但是，在台湾周围，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已逐渐从紧张趋向缓和。

1978年12月，中国改变了以政治思想优先的文革路线，提出了走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近代化路线，第二年即79年1月又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对台湾，也开始表现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姿态。82年就香港前途开始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84年9月，签署了对香港全岛实行主权恢复的中英合意书。另外，在改善以亚太组织为中心的广大的亚洲各国的关系方面，也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这种局势以不同形势涉及到台湾周围的国家。在与台湾同样搞“独裁体制”的菲律宾及韩国，已开始出现学生及群众要求民主化的现象。菲律宾在86年2月，结束了马克思的长期政权，得到民主派支持的阿基诺夫人就任新总统。韩国在要求民主化的同时，人们还在极力要求朝鲜半岛之间的“南北对话”，85年5月南北的红十字会进行了会谈，同年9月，实现了南北间的故乡互访和亲人再会。

这种巨大的时代变迁和环境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波及着台湾。在“台湾内部的政治民主化”和“对中国大陆政策”方面，不得不采取新的对应措施。

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的冲击

在这种情势下，当时在台湾具有绝对权威的国民党主席兼总统蒋经国一马当先在86年春天开始了真格的“掌舵”工作。3月29日，在隔了两年半后在台北召开的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蒋经国主席提出了为打开僵化无策的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总会结束后，4月9日在国民党中枢部又设置了一个“政治革新十二人小组”。他还指示，要讨论研究一直被禁忌的有关解除戒严令的措置，以及涉及到取消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

正当这即困难又复杂的工作有了点头绪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迫使要改变对中国大陆基本政策的冲击性的难题。那就是86年5月3日台湾中华航空的货机到中国政治避难的事件。问题是，事件发

生后，机组人员之间出现了“内部分裂”现象。王锡爵机长明确表示要到中国政治避难，但同机的董光兴副机长和邱明志机械师却希望返回台湾。还有，怎样处理那架货机也成了问题。

大陆方面希望这次事件能作为中国人之间的问题来处理，并能与台湾当局“直接交涉”。但对此国民党政权当初却坚持要通过第三者来“间接交涉”，因为对中国共产党他们一直采取的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

两岸第一次实现直接交涉

在国内外的注视之下，台湾当局最终表示了作为“人道上的问题”来处理的态度。5月17日在香港实现了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者之间第一次历史性的“直接交涉”。

这个新闻报道出来后，国民党内部有人感到惊恐万分，犹如“晴天霹雳”。说是“人道上的问题”，但台湾打破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三不政策”的禁忌，与中国大陆进行直接交涉，这可是个重大的新情况。内外一致认为，其背后有蒋经国主席本人的“政治决断”。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在“直接交涉”开始前的5月1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曾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工作在愈日加强，我们有必要对此采取临机应变的措置。”

在香港进行的海峡两岸第一次“直接交涉”分别由中国方面的中国民航和台湾方面的中华航空的负责人担当的。交涉一直进行着实务性的协议，两天后的5月19日，双方达成协议，同意除了希望在大陆政治避难的王机长以外，其他的机组人员及飞机将经由香港返回台湾。董副机长和邱机械师于同月23日返回台湾，第二天飞机也返回了台湾，事件得以圆满解决。

“直接交涉”的经过，香港、北京及台北都加上解说作了详细的报道。香港的新闻媒体是左派右派都有，“百家争鸣”，但大部分对这次中华航空事件的解决也是表示欢迎的。5月21日的香港《快报》（一家中立右派的报纸）这样评论道：“负责交涉的中国民航和中华航空双方，站在对等的立场上，表示了相互的理解和让步，使得难局得以打开。”

这次政治避难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方法也给日本的华侨社会很大的冲击和震动。事件解决后，我马上从东京到横浜、大阪、神户等地，听取了他们的反应和意见。

在日华侨善意的反应

“听到‘直接交涉’的新闻时，我都怀疑自己的耳朵。但后来想起了‘血浓于水’这句话。”

这是横浜中华街台湾出身的料理店店长的反应。

“交涉的结果是令人高兴的。台湾和大陆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还很大很大，但即使是花再长的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

在大阪见到的台湾出身的客家人（分布于中国各省及世界各地的汉民族的一系）谢坤兰这么说。她是在日客家组织“崇正会”的副会长，同时担任着尼崎市内商店街的理事长，还是一位经营医院和老人院的企业家。

由大陆和台湾双方参加的神户中华总商会的会长陈德仁（广东省出身）说：“中英谈判决定了香

港回归中国，澳门的回归谈判也将从6月下旬开始在中葡之间进行。这是历史的潮流。我们希望中台直接交涉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陈会长还担任着华侨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和孙中山纪念馆的副馆长的职务，他补充说：“孙文先生在地下对这次的直接交涉也一定感到高兴的。”

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出身的林同春中央实业社长，是一位在当地有实力的人物，他一直说：“真是太好了。”

“我在台湾海峡两岸都有亲戚朋友，最近双方要我转的信越来越多。台湾方面拒绝‘直接通邮信’，这点首先希望能尽可能改一改。”

“去年神户的福建同乡会组成了四百二十七人的代表团去了大陆，在福州召开了总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时，我们直率地指出，与台湾比起来，大陆经济建设落后了很多，很多寺院任其自然，没有加以修复等等，大陆的人都洗耳恭听。这种变化，令人期待。”

爆发出民主化的要求

但是，再进里一步，就可以看到华侨社会也是复杂多样的。有人说，这次的政治避难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闹剧”。

在东京新宿见到的一位台湾出身的知识分子就这么说：

“政治避难的王锡爵机长肯定是潜入台湾的中共间谍。国民党知道这个也就同意直接交涉了。我们要求从大陆来的那少数几个国民党头头们能解除长年戒严令，我们的目标是台湾的建设由台湾人自己来搞。”他代表了“独立派”的主张。

与此相对，也有人一边在要求解除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同时还一边提出应该加深与大陆的交流。我在大阪的西成区就见到了这样的几位。

“台湾有‘三禁’，即‘宵禁’（禁止夜间外出）、‘党禁’（禁止组成新党）、‘报禁’（禁止创刊新的报纸）。这些都应该解禁，确立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台湾经济发达了，教育水平也提高了，但在政治方面比菲律宾和韩国都落后。”

他们对台湾岛内及国外的信息都了如指掌，给我看了不少种资料。有美国、香港出版的华语报及英语报，还有台湾内部的“党外人士”（非国民党系的活动家）发行的杂志等。

我看了一下，有报道以美国上院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下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太平洋问题小委员会委员长索拉滋等为后盾，提出要解除台湾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进行总统直接选举，并号召结成“台湾民主党”的消息。还有的报纸介绍了到中国大陆政治避难的台湾原立法委员黄顺兴的最近情况。

促使两岸交流的民众

他们手里资料和信息确实是种类繁多。这些资料和信息让我看到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日本无法看到的、台湾内部及海峡两岸不断出现的新动向。

其中表现得极为强烈的是民国75年（1986年）4月28日发行的周刊杂志《民主时代》的封面。

封面是这样一副表现鲜明的漫画，在台湾当局者拒绝中国大陆呼吁的手势下面，海峡两岸的民众正满脸笑容地进行着来往，往大陆带电视、收录机等。

“这在一两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要在那时，不但杂志马上会被没收，发行人也会立即遭逮捕，被判无期徒刑。这样的漫画能堂堂地发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顺便说一下，这期周刊杂志的头条报道是全文转载了香港的一份中立杂志《百姓》里的一篇文章“海峡两岸直接贸易的现场报道”。

在中台直接交涉的激动和兴奋告一段落后的5月末，传出了由于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事件，航空当局的最高负责人辞职的消息。接着的新闻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台湾对大陆的‘三不政策’将既于以往，今后也不改变。”

肩负“两个命题”

我返回东京后，见了亚东关系协会（现在的台北驻日本贸易文化代表处）的顾问兼新闻组组长（当时）钟振宏。

“有道是人命重于地球。出于人道的立场，我们才不得已接受了‘直接交涉’，但政府的‘三不政策’将不会改变。当然，至于台湾独立什么的，那权当别论。我们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才使得台湾的经济繁荣发达起来的。我们希望国内外的人能认真地认识到这个事实。”

结束采访后，我在书店看到了一本刚摆出来的新书，书名是《想更多了解台湾》（戴国辉编，弘文堂出版）。这本书由台湾、香港、日本等十九位学者和专家共同执笔，涉及到台湾的语言、历史、社会、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各方面，是一本力作。

在“政治”那专栏中，对强人蒋经国总统的政绩给予了评价，同时还写到，台湾内外与国民党统治进行对抗的势力增大了，国民党如果只靠“吸收进来”和“排除出去”等那一套老办法是无法应付的。专栏中还指出，像戒严令等这样的国民党政治的基本结构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发生“流血”的悲剧。

台湾内部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同时，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今后将会怎样发展下去？采访结束后，我强烈地感到，在中台直接交涉的背后，台湾一直肩负着这两个大的命题，并将出现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局面。我从心底里涌现出要亲眼目睹这种局面的欲望。

蒋经国总统改革的决断

1986年春天以后，台湾内部的政治改革和对中国大陆的政策，即使是从旁观者来看都能看到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里“来自下面的要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来自上面的改革”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掌握着改革方向的实权者蒋经国的“政治决断”起了很大的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当局要把无法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遗产”通过最高领导的“强人”之手，来进行改革。

第一次复数政党选举得以实现

86年9月28日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台湾，“民主进步党”（简称民进党）作为第一个在野党宣告成立。与此相呼应，在美国政治避难的许信良原桃园县县长（前民进党主席）等人也准备在10月4日在洛杉矶成立“民主进步党海外组织”。

对此，治安当局强调要采取“严管的方针”，但掌握着党、政、军大权的蒋经国总统以其最大的权威却表现了“柔软对应”的态度。10月7日蒋总统在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主古拉汉姆时提到，任何的新党都必须遵守三个条件：①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②支持反共的国策；③与台湾独立运动划清界限。这表明了解除“党禁”的方针。同时，蒋总统还说：“不久的将来将要解除戒严令，与此同时要制定国家安全法。”

在第二天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蒋总统进一步指出了“顺应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的重要性，并号召全体党员“以宽容的心情来维护安定和团结。”这些发言，可以证明，解除戒严令并容忍新党组成是蒋总统的强烈意图。

也许是不能错过这个良机吧。民进党于11月10日在治安当局戒备森严中在台北市内的一家酒店里强行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第二天的11日又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江坚鹏为第一代党的主席。尽管还没得到公认，但民进党却以实质上的在野党身份参加了12月6日的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举。在台湾历史上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复数政党的选举。

加速与大陆的民间交流

强人蒋总统的发言给了台湾人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这成了在对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强权统治下的台湾内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重新调整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巨大契机。

最初的开端起于86年5月发生的中华航空飞机政治避难事件，围绕着事件的处理，台湾以“人道主义”为理由，做出了与大陆“直接交涉”的决断。其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通过香港等地，在“人”和“物”的交流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蒋总统10月8号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的发言（前面已提到）使这发展愈发加速。

来自在野党的民进党及国民党下面的要求也不能忽视。民进党在其纲领中明确地写上了，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要求居住在海外的“本省人”（即台湾人，译者注）可以回台湾探亲，同时，也尊重“外省人”（即从大陆去台湾的人，译者注）回大陆探亲的愿望。

受此刺激的外省人，特别是那些在“国共内战”后从大陆移住到台湾的原国民党军的“老兵”们，多次向当局提出要回乡探亲。还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外省人回乡探亲、访亲探友座谈会”。

国民党一直抱着“只有一个中国”的理念，主张“中华民国”具有正统性，对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在公开形式上依然是实行“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但对民间接触，则逐渐开始表现了柔软、宽容的态度。

访问时隔四十一年后的台湾

我一直注视着台湾局势的这种变化。87年2月我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长时间以来我先后以香港、北京和新加坡为基地，在亚洲地区进行过广泛的采访，但由于“政治理由”还从没直接在台湾采访过。但蒋总统说的“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使得我的台湾之行成为可能。

手续办得很顺利。87年3月19日，出发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又回到了3岁到中学二年级养育了我十一年的“第二故乡”，这段时间相隔整整四十一年。

下午两点多，我乘坐的中华航空的飞机降落在台北郊区的中正机场。当我走下舷梯，踏上台湾大地的时候，一种难以形容的怀旧之情震撼我的全身，我不由得泪流满面。

一直担任朝日新闻联络员的骆文森在机场迎接了我。通向台北市区的道路单向都可以并走三台车，非常漂亮。马路两侧的亚热带常绿树一直向前延伸。快到市内时，可以看到远处的住宅区和越来越多的商店街。市区内高楼林立，我小时候记忆中的台北面貌，已完全变了样。

这段空白也许是太长了。在这期间台湾人民完成了令人震惊的建设和发展。对此，我衷心表示敬意。

我在台北站附近的“中国大饭店”住了下来。这是一家比较旧的中级水平的宾馆，给人一种如同已家的感觉。宾馆座落在繁华街的一角，行动出入很方便，我解下行装，冲了一下淋浴，那时天也快要黑了。

“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

也许是东京朋友给联系的，台湾有影响的报纸《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四、五位记者到我住的宾馆来看我。他们是几位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属于政治部和社会部。他们邀请我去了他们常去的饭馆。

他们问我“想吃点什么？”我不假思索就回答“米粉”。接着，我说：“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然后又点了些菜，对我这位相隔四十一年返回“第二故乡”的“稀客”表示了热烈地欢迎。当我把米粉夹到嘴里时，小时候的那种香味和味道清晰晰地又回到了嘴边。

我们不停地干杯，话说得很起劲。不知不觉一些完成了各自工作的记者也聚了过来，一下子就增加到十五六个人了。我听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热情畅谈了最近台湾发生的变化，以及现在台湾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再次深深地感到了访问台湾的意义。

第二天早上10点前，骆联络员带我去新闻局打招呼。在那儿，我还见到了以前在东京认识的几位朋友。他们殷勤地接待了我，并让我谈了一下访问台湾十二天的日程安排。

新闻局已经为我安排了不少去访问的地方——国民党中央本部、行政院、立法议会、台湾大学、中央政策研究所等等。

我提出，除了台北市内以外，我还特别想看的有我少年时代呆过的板桥、基隆、淡水等地。另外我还想去一下北回归线经过的台湾中部的嘉义、南部的高雄、屏东，以及最南端的鹅銮鼻。

另外我希望给我三天的“自由活动”时间。我想去看一下少年时代曾住过后地方、曾上过的中

小学，以及人多热闹的繁华街道和夜市。

还有，我也很想知道一下一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情况和他们的想法，还想见见刚成立的民进党的领导人。新闻局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这些要求，我非常感谢。

怀旧之情欲止无能

第二天下午，我在日程安排的空隙时间里，抽身去了一下我从小学四年级到中学二年级曾住过的台北市内的住处（战没者遗族住宅）及母校。

我小学高年级三年渡过的幸小，好像已改名为“幸安国小”了。教学楼和操场都已经改建过，但以前的模样却还依存。不过学校附近原有的遗族住宅却已不在了。我以前住过的平房地方，现已盖了一栋雅致的三层楼房子。

附近的一条叫“堀川”的小河，我那时经常去那儿钓鱼，现也已被填了起来，上面修了柏油马路。河两旁宽宽的石子路现已成了商店街，漂亮的楼房鳞次栉比。

我曾上过的台北一中（现名为建国中学）的校舍是用红砖砌起来的，现在还几乎完全保留着那时的模样。住过的地方已变得面目全非，但母校却丝毫没有变。一种欲止无能的怀旧之情涌上心头，我靠在母校红砖墙上，让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学校正门对面的植物园还在那儿。园内修剪得整洁，种植着各种各样的亚热带植物。其中一棵大榕树上垂下无数根长长的“树须”，形成了宽大的阴凉处。

我不禁要了一片椭圆形的榕树叶子做了一个叶笛。这种叶子很有弹性，把它弄圆后，一头弄破，用嘴一吹，就可以发出“哗—哗—”的声音。同童年的声音一模一样。小时候学会的一首童谣又回到了脑海里。

“大榕树象老爷爷，
长长胡须挂胸前。
春风吹来沙沙响
飘啊飘啊好幽闲。”

台湾——榕树——我的童年……

我一边沉浸在这种伤感之中，一边突然想起了“北国之春”。这首流行歌曲在台湾改名为“榕树下”，但旋律没改。也许是生长茂密的榕树可以使人追忆遥远的过去和自己的故乡，给人一种温暖的柔情吧。

那天晚上，我去了人群喧闹的龙山寺和华西街。夜市上摆满了五颜六色各种各样吃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我以前很喜欢吃的点心和水果，——李干、花生糖、莲脯、油榨果、龙眼、甘蔗，木瓜、菠萝、杨桃、芋冰……

看到眼前这么多以前喜欢吃的东西，我每样都买一点，一边走一边吃。那时，一种独特的，好久都没闻到的香味直冲脑门。一旁的骆联络员笑着忠告我：

“那样吃会吃坏肚子哟。”

夜市的“熊猫”使我感动

夜市上还有不少卖日用品的商店。我们沿着这些商店边走边看，经过一家玩具店门口时，我不由地停下了脚步，我看到了店内摆着布做的熊猫。

不用说，熊猫是全世界只生存在中国大陆四川省深山里的“国宝”。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曾被送往日本、美国等几个国家，但同胞们住的台湾还没有。玩具店里卖着布做的熊猫，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

我问店员，“这熊猫是哪儿做的？”他回答说：“是台湾做的。”我拿起来看了看，做得很可爱，一个一百五十台币（约六百五十日元）。他说：“台湾要是真的有真的熊猫就好了。”

五十五岁的我，在相隔四十一年后又重访了台湾，我只想到把自己年幼的时光与台湾连在一起也真有点不好意思。听到店员的话后，我才第一次回到了台湾所处的现实上来。

在巨大的时代变化中，在相互极其“敌视”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互相进行交流的自然愿望。

不管是住在哪儿的人，不管相互之间是多么地仇视，总有一天一定会和解的。尽管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从相隔四十一年后对“第二故乡”的重访，我强烈地感到了这一点。

在台湾还有很多各种场面的采访在等着我。对小时候养育了我的台湾的怀旧之情，就到这儿为止，让它永存我心底吧。

向不断高涨的“禁忌”挑战

1987年3月在台湾引起大变革的浪潮越来越高。最高实权者蒋经国总统的“由上而来的改革”给一般民众一种心理上的解放感，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自信，激起了广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对自由和民主化的欲望。同时，还促使了对一些长期以来被禁忌的政策和思维的多样化，在内部进行变革的同时，在对应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方面也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弹性。

“我给你讲”

我以台北为基地去了板桥、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几个主要城市后，23日我飞往南部的高雄。这是一座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当时）的、台湾第二大城市。

那天晚上听说在市内的一座大公园里将召开“反对国家安全法说明会”，我直奔那儿。这是由还没得到公认的、台湾第一个有实质性的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所主持的集会。在激情洋溢的广场一角临时搭起了一个高台，上面挂着几个灯泡。

“国家安全法是变形的戒严令。”

“国家安全法里写着‘山防、海防’的规定。也就是指防止来自山岳地带和海岸线的武力侵略。这不是什么‘国家安全法’，是‘国民党安全法’。”

当地出身的一位民进党领导，手里拿着麦克风正在演讲着。台湾话（即闽南话）的口头禅“我给你讲”不断从他嘴里说出来。少年时代这句话听得耳朵都快起老茧了，是一句“好久没听到的怀旧的话”。意思是“我从心里想说”。这句话台湾人对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经常说。现在又用到对执政党的国民党身上了。

满场的一千多听众对“我给你讲”，以及使出全身抖擞在演讲的演讲者表示支持，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副情景有力地表现了台湾人民对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

说是在戒严令下，但对政府当局的批判和攻击还真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我环顾一下，周围附近哪儿都没看到穿制服的警察。

“三个条件”与“住民自决”

86年10月蒋总统提出了解除三十多年来一直实行的戒严令，并指示允许组成新的政党。

从那以后，台湾政治的中心课题就移到了怎样解除戒严令和“党禁”，怎样制定解除后的政治活动的规范。在台湾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坚持，在解除戒严令后要制定国家安全法，其草案已提交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立法院正在审议之中。

在“党禁”方面，由于修改了“人民团体组织法”和“公职选举罢免法”，允许组成新政党，所以现在面临着的是制定政治活动的规范。其核心是蒋总统在86年10月7日提出的“新党组成三条件”，（即①遵守法律；②支持反共政策；③与台湾独立运动划清界线）要写进法律中去，以此为组成新党划上框框。

对此，在86年12月的选举中，作为实质上的在野党第一次参加的，并开始发展了其势力的民进党，在台湾各地召开了反对集会。

他们坚持“国家安全法是变形的戒严令”。同时在其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关于台湾的将来要实行“住民自决”。国民党对此表示反对，批判其是“住民自决是搞分离独立的理论”。

就这一点，我寻问了民进党第一代主席江坚鹏。他是这样说的：

“台湾住民长期以来，先后被荷兰、西班牙、清朝政府、日本和国民党限制参加政治活动。我们的目标是，政治要尊重台湾一千九百万住民（现在已达二千二百万）的意思，这当然包括早期来到台湾的‘本省人’，也包括国共内战后从大陆来台湾的‘外省人’，以及原来就居住台湾的山地同胞。”

要求“回乡探亲”的运动在进行

国民党中央本部自从中国大陆移到台湾以来，一直是“外省人”掌握着政治的实权，“本省人”很难有机会对政治发表意见。但可以说，两者之间的隔阂在缩小。

我从台湾南部采访结束后回到了台北，3月26日，我去看了一下在位于市内繁华街头的一所小学召开的题为“返乡、探亲运动”的演讲会。这个运动是要实现“外省人”能回中国大陆“探亲”，以及居住在外地的“本省人”能回台访问。这儿的演讲大部分是用的普通话（汉语）。

“我们已经忍耐四十年了。作为人道上的问题，也该到实现的时候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交流只要进行，就会加深海峡两岸的相互理解，也能缓和紧张的局势。”

就着挂在台上的一幅布幕，他们还放映了位于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厦门市和桂林的风景、以及万里长城的幻灯片。字幕上还出现了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脚踏故乡的大地，哪怕是一分钟也好。”这次集会是由“本省人”为基础的民进党主持的。

这在前不久还是不可想象的现象。

台湾真是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国民党政权对中国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的原则尽管没有变，但对人心趋向似乎是宽容了很多。

3月下旬在台北我看到高雄的一份有影响的报纸上登载了有关“与中国大陆的体育交流”的民意测验。这个民意测验是国民党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进行的。

“如果在台湾举行国际比赛的话，你同意让大陆参加吗？”其结果是：50%表示赞成、10%表示反对。学生表示赞成的竟达到81.5%。

在报纸上登载这样报道的本身，就表明了台湾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社会的多样化与高学历化

每到一处我都发现人们脸上的表情及谈吐都洋溢着对明天的希望。

“长时间来，一直规定头发只能留到耳垂。但从今年2月开始，头发可以留到肩膀了。”

一些高中三年级的女学生非常高兴地说道。在位于台北市南边板桥市的一所名为“林家花园”学校里，女学生们考完了期末考试，她们长长的秀发正随着春天飘逸。随着戒严令的解除，迪斯科也被“解禁”了。

台湾中南部嘉义市近郊的一位高中老师这么说道。

“我父亲以前是村长。当时村里的人十个人就有十个人对父亲说的话是洗耳恭听，照着办事。但现在认真听村长话的十个人中最多也就三、四个人吧。”

台湾人均总产量达三千七百美元（现在是二万二千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10%。在这种惊人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教育得到普及，高学历化在进行。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台湾人能进中学的，一个班也就一、两个人吧。我有三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一个是建筑工程师，一个是中学老师，还有一个在一家与日本合资企业里工作。”

在南部的屏东见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钟荣胜（五十五岁）自豪地这么说道。

世代接班的要求强烈

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关心。台北等大城市里，书店越来越多，到处都挤满了年轻人。也许是产业高度化的一种反映，像企业管理、电子工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书籍前面总是站满了人。

在街头，还有很多书摊，像解剖政治动向之类的杂志，转眼就卖光。像这种杂志据说有五、六

十种，其中有些由于表现得太急进而遭到禁止发行。但遭到禁止发行后，又改头换目一下重新再发行。书店的店员苦笑着说：“这是发行和禁止发行在作无谓的重复。”

随着这种变化，世代交接班就成了台湾迫在眉睫的课题。在台北见到的民进党的理论家谢长廷常务委员这么说道。

“最高领导班子里的大多数人已是七、八十岁了，在权力框里坐了三十多年。立法院里代表中国各省的‘终身议员’占大多数，而且老龄化很明显。与此相反，台湾出身的议员很少，这与现实太不相称了。”

要求领导班子年轻化的呼声，在国民党内也有。三年前，国民党提拔了三十六岁的马英九为党中央本部副秘书长。马氏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据说还与来自大陆的留学生直率地进行过意见争论。这是一位既有东洋的举止礼貌、又有欧美的开放率直的俊才。这表明了与历来国民党领导人完全不同型的年轻人势力在抬头。

在一份有力的月刊杂志《天下》（三月号）上刊登了一篇长达四十页题为“老、中、青的世代交接班”大特集，指出，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权力再编”是当务之急。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有识者的意见：“老一代的多数人是生活在对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的回忆的世界里，他们是在那种世界里考虑当今的台湾问题。”“不能再允许拒绝变化的政治态度了，这是时代的要求。”

畅谈台湾未来的研究生

我在回国的前一天晚上，与台湾大学的一些研究生，就台湾的将来进行了畅谈。他们很多人都说：“五年到十年之间一定会有巨大的变化。”同时还提到，“像学校的自治、社会的民主化、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来自美国对台币增值的巨大压力等等，要考虑的问题还很多。”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对于作为今后问题之一的“台湾的民主化”和“住民自决”表示很关心。

关于“住民自决”民进党已写进其党纲领里。对此，国民党首脑层及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严厉批判其为“引起台湾分离独立的理论”。

研究生的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认为，“住民自决论不应该那样轻率地提出来。”也有人认为，“住民自决是民主化的归结，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住民自决并不一定是台湾分离独立的同义词，”还有人说：“在独立的基础上，于中国大陆改善关系。研究生中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但都是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绝大多数还没有亲身在外面的世界里体验过，当然更不用说中国大陆。”

他们说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后，问我持有什么看法。采访记者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当然我不能说我无法奉告。

探求打破“非友即敌”的框框

“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衷心希望台湾人民能生活得幸福。但不赞成把台

湾的民主化与台湾的分离独立连在一起。”“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对此是绝对不会容忍的，而且绝大多数大陆人民也会反对的。如果真要搞独立，很有可能会使用武力。这样，就会发生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这不但破坏了亚洲也破坏了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定。台湾最依赖的美国也不希望如此。”

接着，我谈了2月份刚访问了北京的美国国务长官舒尔兹所重新确认的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舒尔兹明确强调了“两个基本政策”，即①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②希望海峡两岸的问题能和平解决。最后我说，大多数的日本人也是这么希望的。

议论进行到深夜。但谁也没法把台湾将来的远景给清晰地描绘出来。这时，一直沉默着的一位研究生开了口。

“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来组成合作一个能应付任何变化的坚强的‘智力集团’”。

听着这些不同的意见，我强烈感觉到，台湾新一代在变革的潮流中正在认真地探求着打破历来“非友即敌”观念的道路。

我衷心希望，这一探求能通过聚集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巨大智慧，在不久能得以成功。

戒严的解除和“回乡探亲”的实现

相隔十四年的重访台湾，才有十多天，只能是“走马观花”。但这不仅激动了我对幼年时代的怀旧之情，同时使我对台湾发生的惊人变化，特别是处于变革期台湾的新动向有了很强烈的印象。站在权力顶点的蒋经国总统的“来自上面的改革”与“来自下面的要求”微妙地在相呼应。我确实感到，这种局势给人一种解除长期以来的戒严令和实现同中国大陆探亲的预感。

连接民族之心的熊猫

访问台湾的兴奋还没平静下来，我在1987年4月中旬又接着去访问了中国大陆。这次是应九十高龄的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原全日空航空公司社长，现已故）冈崎嘉平太的邀请，使我有机会与冈崎先生同乘全日空飞往中国的首次航班飞机。实现全日空连接日中空路是冈崎先生多年的愿望。这是我以前担任亚洲总局长时，与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同行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次。

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典礼。使我能与一些北京的友人重温了一下旧情。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时，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我看到4月1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登了一则题为“台湾的报界对大陆赠送熊猫表示欢迎”的报道。其内容是，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日本的国会）上，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出身的代表提议给台湾赠送一对熊猫。这个消息传到了海外，台湾一家有力报纸《中国时报》驻美国特派员给其总部发出电报。这家报纸说：“北京动物园向台北动物园赠送的话，双方立场平等，没什么政治问题。台北动物园可以向北京动物园回送台湾特有的珍贵动物。”

这使我想起了在台北看到的布做的熊猫玩具。第二天星期天的下午，我去了一趟北京动物园。最受欢迎的果然是“熊猫馆”。生后六个月的小熊猫“良良”正在室外宽大的活动场上。栏杆的外围

是人山人海。还有的父亲让小孩跨坐在肩上看。“良良”的每一个可爱的动作都引起人们的激动，又是欢声又是掌声。

熊猫真是可以连结海峡两岸人心。我去饲养室见到了值班的刘茂堂先生，他很高兴地说：“最近东京上野动物园给我们寄来了熊猫‘童童’的生长日记和照片。”当谈到给台北动物园赠送熊猫之事时，他说：“外国都有了，台湾同胞反而看不到，也太离谱了。希望熊猫能去台湾的日子早点到来。”

对台湾动向的好感和担心

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的一些旧交为我们召开了欢迎宴会。他们问及台湾最近的情况，我把自己所见到和所感受到的照实说了。现在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部首席代表马毓真也在座。

他们对台湾的变化、特别是对促进大陆交流的动向表示了好感。但对“住民自决”表示了极大的担心。这种反应是我在预料之中。

“我们赞成台湾的民主化，但反对把台湾的独立连在一起。”这跟我对台湾朋友说的完全一样。但同时，他们又说：“台湾人在历史上还从来没尝过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当‘主人公’的味道，对此，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予考虑。”

这个日本政府也有责任。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后的1894年4月日本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从清朝政府手中抢夺过来以后，一直沦为自己的统治之下，长达五十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到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的手里以后，灾难就从未停止过。

中国本土发生了“国共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台湾又被在内战中战败后撤过来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党统治了。而且，在战后冷战体制下，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采取了对华封锁的政策，一直极力地干涉着中国的内政。其结果是，中国一直处于分割状态，隔着台湾海峡严峻以待的“国共对立”持续快四十年。在这种局势下，可以说台湾人一直肩负着“心理上的重压”。

“内因”比“外因”更重要

美国在日本以后实现了对华关系正常化，这使得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大陆也从政治思想为主的文革时代转移到了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台湾的巨大变革就是在顺应这种内外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解决台湾问题，很明显“内因”比“外因”越来越占有更大的比重。对大陆的朋友来说，我说的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海峡两岸的问题归根到底应该属于中华民族自己解决的问题”。然后我引用了中国四位大先人的话，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引用了在中学古汉语课中学过的孔子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修好自身、齐理家道、治理国家、安定天下。

接着引用的是鲁迅的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

然后，我引用了毛泽东《矛盾论》中的一句话：“鸡蛋在一定的温度下会变成小鸡，但小石头即

使是给予一定的温度，也决不会变成小鸡。”在这种情况下，温度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鸡蛋和小石头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最后是引用了庄子的话，“看事物的标准不仅仅只有一个。把人为的标准作为‘唯一’或‘绝对’的话，那将会背道而驰。”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端正态度，希望大陆方面能着实地推进“改革开放”，台湾方面能实现“解除戒严令”和“回大陆探亲”。第二是，不断进行两岸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第三，两岸之间的问题，不是依靠美国、日本等国的“外因”，而是靠中华民族这个“内因”来解决。第四，在此基础上，希望两岸能相互理解、相互让步、相互忍耐、不断探求共存的道路。两岸长期分离，前途也有不少困难，但一定会找到实现“和平统一”的方法。

外交部的那些有能力的干部们，笑着听着我讲我的看法，都没说什么。

戒严令落下了历史性的帷幕

台湾的局势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立法院审议了“国家安全法”（国安法）草案，但民进党内部却提出，在国民党占绝大多数的立法院进行审议不够，准备在街上进行示威游行，以示反对。

87年5月19日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前举行了抗议集会，集会后三千名民进党员和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其中十二名民进党党员代表想要向蒋总统提交抗议书，遭到了坚守总统府周围的警察的阻止。6月12日在由民进党主持的“反对制定国安法集会”上，与右翼组织“反共爱国战线”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以此为理由，在立法院6月23日的全体会议上，国民党不顾民进党对审议的反对，强行通过了“国安法”。接着7月7日又通过了由行政院提交上来的国安法实施细则及要求解除戒严令的两个提案。

国安法全文共有十条，废除了对民间人的军事裁判及禁止组成新党等法令。但民进党对国安法第二条“集会、结社不许违反宪法，不许搞共产主义和国土分裂活动”表示强烈反对。因为民进党在其基本纲领里提出了“住民自决”，他们担心国安法会极大限制其政治活动。

还有一点是，有关被军事审判了的非现役军人的刑事案件在解除戒严令以后的处理的规定。条文写道：“在审判中已定了刑的人，不能向当事法院进行申述、上诉……”（第9条第二项）。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大多数的服刑者很有可能由于这一条而失去被救的希望。

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总统宣布，戒严令将“从15日早晨零时开始解除”。与此同时，新的国安法和同法实施细则将开始实行。三十八年零两个月一直作为国民党统治台湾根本的戒严令，就这样落下了它的历史帷幕。

国防部在14日对在戒严令下受到军事裁判的政治犯二百三十七人进行了减刑和恢复权利，释放了二十三人，并恢复了临时释放的一百四十四人的公民权。这些看起来是为了缓和民进党的不满，但在背后是由于有了蒋总统的（7月7日）强硬指示。

“大陆热”呈过热状态

戒严令的解除也可以说是成了重新调整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一个巨大契机。俞国华行政院长（相当于首相）在戒严令解除的第二天即7月16日发表了废除禁止台湾居民把香港和澳门作为旅游观光第一目的地的行政命令（制定于1979年4月26日）；接着大陆生产的中药成品和原料的进口也得到解禁；9月又提出了允许进口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和学术书籍，等缓和政策。这一连新措置使得台湾的出版、电影、书画、茶道等各界掀起一股大陆热。去香港的旅游者急速增多，与大陆的贸易也进一步得到扩大。另外，由于美国的压力一直陷入汇率人民币高于美元困境的台湾中小企业，开始在大陆投资建工厂。

台湾当局对这种缓和政策带来的民间人的动向，开始一段时间表示了静观的态度。但由于“大陆热”越来越高涨，台湾近海不断出现了大陆的中小渔船，海上的直接贸易在急速地增多。9月15日台湾一家有名的晚报《自立晚报》的两名记者李永得、徐璐经东京进北京，强行实现了对大陆的第一次采访访问。

对这些动向俞行政院长在9月25日立法院的答辩中强调，“大陆是落到了我们敌人手中的‘被占领地区’。我们现在正处在与中共决一雌雄，反乱镇定的时期。对大陆政策归根到底是‘对敌政策’。”向不断高涨的“大陆热”浇了一盆凉水。

“回乡探亲”终以实现

蒋总统已在87年2月就指示从大陆时代起一直得到重用的李焕教育部长要研究制定新的对大陆政策。李焕一直被看作是国民党改革派的重镇，他成立“专案小组”进行了研究，在同年8月新的大陆政策的构想基本上定了下来。

他在9月4日党的有关会议上指出，“国民党决定以在台湾取得的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的成果来对大陆实行实际的而且是有效的‘政治反攻’。”并强调说，“所谓的政治反攻并不是要取代大陆中共政权，而是要促进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和经济开放。”

但是，这种论调一方面激发了台湾内部的“大陆热”，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对此反对的“台湾独立派”的抬头，而且还引起了党内保守派及军队和治安机关极大的警戒。

蒋总统在这种局势下在9月16日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指出：“我们要从人道的立场上考虑到思乡的心情，研究回大陆探亲之事。”同时他提出了前提条件“反共、收复国土、确保国家安全的基本国策不变”。并指示新上任的李登辉副总统、俞国华行政院长、倪文亚立法院长、吴伯雄内政院长，及何宜武国民大会秘书长等五名中央常务委员成为“专案小组”，研究具体政策。

“专案小组”里，李副总统和吴内政部长都是台湾出身。俞行政院长是党内保守派的重镇。加上中央民意代表机构（包括国民大会、立法院、检察院等）中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负责人，专案小组的人员结构，再现了蒋总统的用兵意图，意味深长。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0月14日采纳了“专案小组”的研究结果报告，正式决定解禁台湾居民去中国大陆的“回乡探亲”。对象是除了现役军人和公务员以外的民间人，年龄不受限制，只要大陆还有三代亲人以内的人在，就可获得许可。

行政院在第二天即 15 日的内阁会议上，无改动地通过了上述的决定。吴内政部长在同日下午发表了有关探亲访友手续的细则。内容有：11 月 2 日开始受理申请，探亲一个人一年只能一次，时间在 3 个月以内，等等。这个决定意味着断绝了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交流第一次以“公认”的形式得以实现，其历史意义极大。新华社马上发出大陆欢迎此决定的消息。

蒋经国之死与李登辉的上台

台湾的政治改革及大陆政策的新开展，与内外的环境及潮流的变化起了促进作用是分不开的，这一点不容忽视。但纵观局势的变化过程，具有绝对权威，并且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高令的蒋总统的决断和指挥也起了极大的作用。台湾在国民党一党的独裁下，实行戒严令达三十八年之久，与大陆断绝了一切来往。蒋经国在其晚年约两年的时间内，以谁也无法预料的速度，使台湾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晚年紧紧注视着历史和现实

但是，即使是蒋总统这样的“强人”，也有难以战胜的不幸在不知不觉地困扰着他。

“下届总统将依照宪法进行选举，不由蒋家后代继承。不实行军事政权来统治国家。”——这是蒋总统在 1985 年 12 月 25 日举行的宪法纪念典礼上在国民大会代表面前所说的话。第二年即 86 年 4 月在国民党中枢部设置了“政治改革十二人小组”，从那以后，在“民主宪政”的口号下，与在野势力及民间团体进行对话，推进了政治改革和民主化。

在这过程中，有来自党外势力的多次反对、抗议集会及上街示威游行，也有来自国民党内部保守派不断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呼声。但蒋总统却强调说明，“时代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潮流的变化”，并指示要以“新观念、新方法”来对待反对势力。就这样，蒋总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局，为完成历史的责任倾注了全部的精力。

但自 85 年春天以来蒋总统由于糖尿病的恶化不得不在心脏上装上助跳器，不久下半身又瘫痪了，87 年 10 月的“双十节”，他是坐在轮椅上接见群众的。接着又出现了使他感到雪上加霜的局势。

第一位“本省人”总统得以实现

在这年的 12 月 25 日召开的纪念宪法实施四十周年的典礼上，正当蒋总统就立法院、国民大会等“国会”改革问题作演说时，民主进步党（民进党）的十一名国民大会代表站了起来，高喊“全面改选国会”。在强调逐渐实行了改革的蒋总统面前，出现这样的“挑衅行为”是前所未闻的。这一天民进党还在台北市内的铁路沿线附近举行了有三千多党员参加的集会，而且强行举行了要求“全面改选国会”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加群众达四万人，使得火车停止运行达两个多小时。

这天发生的事件对坚持政治改革要逐步进行的蒋总统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极大的冲击。疾病和高龄使得他体力衰弱下去，加上要求彻底实行改革的民进党等在野势力的强烈挑战，使得蒋总统心

神劳累越发严重。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由于心脏病发作在台北市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七十七岁。按照宪法的规定，李登辉副总统（当时六十四岁）上升为后任总统。国民党在同月27日召开了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李总统为党的代理主席。

最高领导人的交接，使得台湾出现了三个新的局面。第一，按照蒋总统生前所说，“蒋家王朝”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两代告以结束。第二，国民党政权的头把交椅从“外省人”移到了“本省人”来坐。第三，长期以来的“强人”政治告以结束，迎来了重新组成最高领导班子的时期。

李登辉是由蒋总统的牵引，由学者转为搞政治的。因此，他虽然得到了蒋总统的重用，但自己在党、政、军各部门都没有什么基础。而且，比李登辉有着更丰富政治经验的人在各部门里大有人在。

属于政府部门的行政院俞国华院长（当时75岁）是国民党保守派的重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李焕秘书长（当时71岁）是党内改革派的领袖。军队里有蒋经国极信任的郝柏村总参谋长（当时69岁），在掌握特务、情报机关的国家安全会议里，有蒋纬国秘书长（当时71岁）。这些人比李登辉岁数大，而且都具有实力和经验。另外，“外省人”的实权者中，也可以举出林洋港司法院长（当时61岁）的名字。

李登辉总统兼党的代理主席，将怎样指挥蒋经国死后的台湾呢？首先必须建立与这些部门的实权者合作的一种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台湾已从蒋家父子两代的“强人政治”时期进入了“集团指导体制”的时期。

幸运的是，在台湾进行这个重大政权交接时，中国大陆表现了极其友好的反应。共产党向国民党发去了唁电，同时，赵紫阳总书记（当时）还发表了特别讲话，对蒋经国生前的业绩（坚持“一个中国”，解禁民间人到大陆“回乡探亲”等等）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不变，并祝愿台湾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

在这种局势中，李登辉主持了2月3日召开的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了成为解除戒严令后的台湾最大政治课题的国会三机构（中央民意代表机构的立法院、国民大会、监察院）改革的基本方针。主要内容有：①国会三机构的议员改选将逐渐大幅度地增加；②引进终身议员（主要指国民党统治中国本土时期选举出来的代表台湾省以外的各省的议员）自愿辞职制度。同月22日在总统府举行了约120人国内外记者与总统就任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李登辉指出，“要实行民主宪政，朝着以三民主义来实现中国统一的大业奋勇前进”，并强调要继承蒋经国前总统所制定的基本路线。

新旧交接与“台湾化”的人事安排

另一方面，在野势力的挑战也来势凶猛。民进党的姚嘉文新主席在4月17日召开的临时党大会上作了讲演。他提出了：①台湾的国权主权要独立，不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②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或中共要统一台湾的话，我党将主张台湾独立，等五项。

另外，台湾的第二野党“工党”（劳动党、王义雄为主席）5月1日在台北市内也举行了大规模

的示威游行。这天，台湾铁道局的一千三百名火车司机为要求改善待遇一齐罢工，使得铁路运行几乎全面瘫痪。5月20日，为要求政府提高粮食价格，合理使用社会保险等，农民在台北市内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在立法院前与警察发生冲突，有不少人负伤。

88年7月7日国民党在台北市召开了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十三大全会）。这是自蒋主席去世后第一届党大会，新的领导班子将怎样组成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8日党的主席选举，几乎全场（99.3%）一致推选了李登辉。选出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直延用的起立方式，但在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大会代表中，有八位年青代表主张用投票方式，所以他们没站起来。

党中央委员从一百五十名增加到一百八十名。一直沿用的只能从党主席指名的候选人名单中进行选举的方式也得以改正。李登辉采用的是一种“半开放式”，即除了主席本人指名的一百八十名候选人以外，还有由五名以上党大会代表的签名推荐的一百八十名候选人。

其结果令人注目的有，保守派的重镇俞国华行政院长在李主席的提名名单上是第三位，但按实际得票顺序却落到了第三十五位。相反，党中央本部秘书长李焕却首位当选，表明了改革派的突出。新当选的一百八十名中央委员中，有一百零七名是首次当选，平均年龄也由原来的69.8岁下降到58.7岁，出现了年轻十多岁的“新旧交接”现象。

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7月14日选出的三十一名党中央常务委员中，由原来外省人十七名，本省人十四名改选成了本省人十六名，外省人十五名，本省人第一次占据多数。另外有十位长老引退，使得年轻势力也进入党的中枢部门。

对年轻的科技知识出身的官员和外省人进行重用，在7月20日的行政院（内阁）的人事改选中也得到证明。像五十多岁的陈履安经济部长、钱复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郭婉容（女）财政部长、及连战外交部长等人的提拔。正副院长及八名部长中，由原来的四个外省人增加到了六个外省人，而且都是第一次掌管外交、财政等重要部门，“台湾化”倾向已非常显著。

大陆政策的扩大与限制

李登辉总统还是让在党中央委员选举中落到了第三十五位的不受欢迎的保守派俞国华行政院长留任了下来。这样做据说是因为李总统的政治基盘还不牢固，还不得不依靠均衡保守、改革两势力的人事的缘故。

在十三届全大会上，7月12日通过了“国民党现阶段的大陆政策”。在政府一级还是坚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交涉、不妥协），但在民间一级可以扩大各种交流，像新闻界去大陆采访、参加国际体育大会等等，表现了柔软的态度。

根据这个精神，行政院在8月18日设置了“大陆工作会报”（联络会议的意思，座长是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国民党在同月24日也成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座长是前国民党秘书长马树礼）。另外，大陆方面也在8月16日在北京成立了“台湾研究会”（宦乡任会长、赵复三任副会长），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丁关根担任了新设置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同月23

日成立了由民间人为主体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台湾海峡两岸开始了寻求扩大交流渠道的活动。

9月11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联合会议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有三人出席参加了，并且记者也被允许同行采访。10月12日一艘载有六十五名台湾回大陆探亲的客船，从基隆经由冲绳进入了上海港。这是自1949年以来台湾船只第一次堂堂地进入大陆的港口。另外，大陆居民由于看望病人、出席葬礼等理由要去台湾、以及邀请大陆学者等问题也开始列入研究日程。

访问大陆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议员及干部中间也引起了波动。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胡秋原（湖北省出身、七十九岁）在9月中旬访问北京时与全国政协会议主席李先念（已故）进行了会见，并就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此事也许是强烈刺激了国民党中央，致使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开除了胡秋原的国民党党籍。这是表示双方要进行直接的政治接触还是困难重重的一个具体例子。

随着“台湾化”现象不断明显，“独立议论”也越发厉害起来。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在美国等海外国家活动的反对国民党势力的一些台湾回归者表现得很突出，他们公然主张“台湾独立”。

制止搞台独运动

主张台湾“自决和自立”的“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简称FAPA，彭明敏任会长，1982年成立于美国洛杉矶）在88年6月成立了台湾分会。另外倾向于“台湾独立”的“世界台湾同乡会”（会长李宪荣）的第十五届总会8月18日在民进党的协助下在台北县新店召开了。总部设在纽约的“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庄秋雄中央委员等也出席了。

国民党当局担心会对台湾内部产生影响，所以拒绝给李宪荣会长及部分干部入境签证。对此，民进党主席姚嘉元在19日召开的“世界台湾同乡会”的总会上作了演讲。①所谓新的台湾人是指把自己的命运与台湾连在一起的国内外的台湾人；②我们要努力使这种新的台湾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③为了实现有利于台湾人的政治，我们要求全面改选取立法院等机构。——这是陷入“台湾独立”的发言。

但是，国民党方面对把台独论付诸“行动”的人进行了严厉地打击。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的蔡有全和许曹德两人由于搞“台湾独立”，在87年8月30日被判犯有蓄意叛乱罪。在88年1月16日的第一审时两人分别被判有十一年和十年有期徒刑，在8月27日的第二审时，分别减到十年和七年。但“判决有罪”充分说明了当局对搞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后，总的来说是“新旧交接”和“当地化”的色彩越来越浓。同时，与中国大陆交流的促进派和分离独立派各自的活动也越来越升级。

刚站到台湾最顶点的李登辉总统，面对这种局势煞费苦心，研究对策，不断反复强调要继承先人所制定的基本路线。